

简阳县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目 录

青 春 潜	回忆进军西南的生活历程 姜寿生 张允武 蒯千里 (1)
	我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前前后后 沈 群 (7)
	缪小京传略 陈永德 (10)
	忆四川大学“四九血案” 周年纪念活动 陈寿余 (12)
人 物 篇	社会贤达李霜如 张存智 徐正唯 (13)
	徐鹤轩与上海“蜀映川菜馆” 张存智 (16)
	回忆抗战胜利前夕的荣誉二 师及戴坚师长 刘正贤 (19)
	为李青廷代理县长的蒋泰瞻 杨诞孚 (21)
文 化 教 育	建国初期的冬学 黄成文 (23)
	我在育才学校的点滴回忆 赵晚珍 (24)
	简阳第一部《小学教导工作管理细则》 的草拟经过 黄成文 (25)
经 政 概 览	民国时期简阳县征收土膏捐记实 庄 彦 (26)
	简阳县旧政府建制概况 傅兆霖 (28)
	简阳埡口寺水电站勘测记 陈泽先 (30)
	简阳县平泉镇建国前烤烟 种植与卷烟生产简况 罗仲璠 (30)

· 史料补白 ·	《龙泉驿五〇年“三·三”土匪叛乱 和平叛回忆》的补充……………徐友九 (32)
· 百花诗选 ·	乔新象 许荣华 刘徽钦 (二首) 傅承烈 (四首) 杨骏卿 曾士荣 傅 瑄 吴高文 董怀舒 吴叔霞 汪学文 王育生 马益农 肖禹川 (二首) 梅晓初 曾渊如 …………… (33)
· 史外韵白 ·	——介绍简阳老干部局活动 情况……………汪明旭 苏中林 (35)
“纪念简阳县解放四十周年”征稿启事	

审 稿： 蒯千里 李冠雄 刘存品

编 委： 刘存品 张存智 陈揖明 徐正唯 吴高文
罗天有 傅承烈 王安中 罗仲璠

编 审： 张存智

责任编辑： 王能贵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回忆进军西南的生活历程

姜寿生 张允武 翦千里

1949年，我们一群苏南地区的青年学生，响应党中央“进军大西南、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的号召，从江苏无锡行军七千里来到四川简阳，参加了简阳的革命和建设。

南京集训

1949年9月1日，我们西南服务团苏南分团的青年学生，奔赴南京，到达了驻地下关草鞋峡。我们苏南分团一大队编为西南服务团一团四支队二大队。9月下旬，我们二大队划归川南大队，新派杜子云同志任大队长，中队长由朱牧流同志担任。在南京确定了我们进军西南的目的地是川南地区。

在南京一个月，接受短期的军事培训和学习。除进行了军事化、战斗化、集体化的基本军事训练外，主要是学习和听报告。邓小平、刘伯承、宋任穷、万里等首长亲自给我们作报告。他们讲解放战争、讲胜利形势、讲解放大西南的紧迫任务，描绘了人民共和国的蓝图。邓小平同志在题为《老实》的报告中，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实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教育我们要老老实实地改造世界观，老老实实说话，老老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学习，不说假话、空话、大话，做老实人，一辈子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刘伯承同志强调：西南服务团的任务就是为西南七千万人民大众服务，服什么务？就是西南人民要我们去解放他们，军事上肃清反动残余，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我们的任务一是消灭敌军，二是建设西南。第一个任务轮不到你们，而是要求大家在经济建设上为人民服务，使他们翻身，就是说去做“文”的工作，去唱最困难的“文”戏。宋任穷同志在动员时说：我们经常提到要为人民服务，今天是以实际行动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了。到西南去是艰苦的，相信有志的革命青年是一定能够克服的，任何困难也阻挡不了我们革命青年向西南进军。

我们这群青年学生思想比较单纯，性格也比较开朗，一般都具有追求真理，向往进步和关心国家民族的特点，到西南去的道路是我们自愿选择的，大目标很清楚。我们没有想得到什么高官厚禄，也不图什么金钱享受，还作了吃苦的思想准备。但是，我们政治上毕竟是不成熟的，思想上也还比较幼稚。对于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体会，在一定程度上是抱着革命幻想参加人民军队的。首长们的讲话，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参加西南服务团的目的，既不是仅仅为了接受一次时髦的革命洗礼，也不应是为了到革命队伍来寻求个人的生活出路。参加西南服务团，应该是一次献身，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献给革命事业。

虽然选择到西南去的意志是坚定的，但是不能说没有斗争。

我们要同历史上的偏见作斗争。在一般人们的心目中，苏杭是天堂，苏南地区的条件和

环境是优越的。而对天府之国的四川了解不多，误解则不少。例如，传说西南有瘴气，是不毛之地，古人讲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等等，都使人们产生畏惧心理。但是，这些都未能动摇我们的意志和决心，我们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服从革命的需要，甘愿跋山涉水到数千里以外的西南去吃苦，以实际行动克服了旧社会留下的偏见和影响，这是第一关。参加革命，投笔从戎，不仅是我们个人的大事，也牵涉到每个成员的家庭，不能不在每个家庭中引起剧烈的感情上的波动。得到父母与家庭鼓励和支持的同学，无不兴高采烈，从思想上解除了后顾之忧。但也有的家庭反对子女到西南去，不愿子女远走高飞，害怕子女吃不了苦；西南尚未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更怕子女牺牲等等。他们采用各种手段动员自己的子女回家或就地参加工作，有的是老父老母来劝说、哭闹，甚至以死相威胁；有的是年轻的妻子或未婚妻来拖后腿；有的以回家结婚来打消去西南的念头等等，不一而足。缪小京同志的妻子，带着小女儿眼泪汪汪地要求小缪看在女儿名下，留在苏南不去西南，大家帮着做了几天工作才把她说通。许卿同志的父母及其未婚妻也来拖后腿。小许东躲西藏，实在无法，回家逗留一月后又偷跑到南京，不久家里又从无锡追踪到南京西南服务团驻地。后组织上出面热情接待，耐心说服，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他（她）们动员回去。在组织和领导同志的教育下，在战友们的帮助下，不少同志以极大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冲过家庭关，顺利地踏上去大西南的征途。

家庭关只是一部分人面临的难题。能否闯过生活关，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受的严峻考验。从生活方式上，参加革命前后起了根本的变化，要结束过去那种自由、散漫、舒适的家庭生活，而投身于严肃、紧张、朴实、单一的军队生活，不发工资，享受供给制待遇。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转变为一名革命战士，不少同志开始很不适应，很不协调。从生活标准上，组织对我们刚入伍的青年学生给了很大的照顾，伙食标准比大灶提高了不少，接近于当时部队的中灶标准。尽管这样，可是对于有些家庭比较富裕的同志来说，仍然低于家庭的生活水平，而且在行军路上的生活将会更加艰苦。这样的生活关，我们能闯过吗？事实证明，我们经受住了这场考验。因为我们参加革命到大西南去就不是为了享乐，“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从思想上已经做了吃苦的准备，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生活标准的降低算得了什么。

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开始了，每人配发了棉被、油布、纸质雨伞、胶底帆布鞋、搪瓷饭碗等生活用品。大队和中队干部给我们讲行军注意事项，背包如何打，东西何如带，规定了负重数量，精减各人所携带的物品。最难办的是精减轻装，除掉配发的东西外，自己原来的物品这样想带，那样也舍不得丢，挎包装不下就往背包里打，结果背包仍然超过重量。

一切准备就绪，整装待发了。

行 军 七 千 里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们和南京人民一起走上了街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十月二日深夜列车离开了南京，我们告别了江苏的父老姐妹，一次历史性的向大西南进军开始了。

从十月二日离开南京到二十二日抵湖南益阳，这是行军的第一阶段，基本上是乘火车和乘船。我们乘的是军列闷罐车。由于人多车少，非常拥挤。吃的是干粮（饼干、大饼），喝

的是冷开水，有时开水供应不上，只有用冷水解渴。必须等列车停下才能大小便。虽说是乘车，还是十分艰苦的。列车运行在津浦、陇海、平汉、粤汉四条路线上，沿途经过蚌埠、徐州、开封、郑州、许昌、信阳、汉口、武昌、岳阳等名城，跨越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六省。十月十日抵汉口，住在江汉关的中纺公司仓库。在汉口休整了三天，发了新棉衣和胶底帆布鞋。十月十四日乘敞棚车沿粤汉路到湖南的岳阳。

上级决定，由岳阳乘帆船飘洞庭湖到益阳。为了解决导航的问题在岳阳住了三天，瞻仰了闻名已久的岳阳楼（又名鲁肃阅兵楼）。楼在洞庭湖畔，湖水汪洋，远帆点点，却也别有一番风光。观看了清代书法家书写的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其中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引人深思。古人能有这样的崇高思想境界，难道我们这些革命青年不能达到吗？

在军车上基本是吃干粮，谈不上蔬菜，更谈不上加餐。到了岳阳，我们饱餐了洞庭湖的鱼，几乎每顿都离不开鱼，每桌（实际上就是一个组围蹲在地上）有两洗脸盆鱼。头一天大家吃得兴高彩烈，第二天、第三天全被腻得吃不消了，要求吃蔬菜。这是我们有生以来吃鱼吃得最痛快的一次。

十月二十日乘帆船飘洞庭湖，有风扬帆，无风由小火轮拖。白天航行，晚上靠岸宿营。洞庭湖上白浪滔天，阵风吹来，船左右摇摆，小火轮吃力的拖着五只大帆船，船速很慢。第一晚宿营江家冲，二十日晚宿营另资口（所谓宿营，就是船靠岸，大部分同志仍睡在船上，只有少数在甲板上的同志上岸住宿）。二十二日抵益阳，结束了第一阶段的行军生活。

十月二十三日在益阳休息一天。二十四日起进入行军的第二个阶段，开始步行军了。目的地是湖南桃源，要求四天抵达。路上分别宿营在军山铺、太子庙、石门桥。二十七日抵达桃源县城。桃源是个风光幽美的小城，我们过敏的把它跟陶渊明《桃花源记》联系起来。纷纷询问当地老乡有关桃花源的地址，虽然不是书上说的那个桃花源，风景如画的桃源，倒也象一个世外桃源。

在桃源休整七天，进行整编。十月三十一日听了川南区党委书记李大章的编队动员报告，重新进行编队。分配了各大队应去的地区。全支队共编七个大队，一个直属中队。二大队为新闻大队，四大队为财经大队，其余则以一个地区为一个大队。一大队为宜宾大队，三大队为乐山大队，五大队为资中大队，六大队为泸州大队，七大队为自贡大队。直属中队属区党委和行署。我们是五大队——资中大队，大队长王宗其、政委陈刚。原来的大队长杜子云下到我们中队任中队长，李志深任指导员，原来的中队长朱牧流任分队长。原来的班（组）基本不动。十一月二日，刘披云同志针对我们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了解答式的报告，例如苏联红军在东北的情况，苏联拆走东北的机器，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等问题。报告很对我们的胃口，解决了不少平时存在于我们思想上的许多疑问。大队长和政委向全大队介绍了川南和资中地区的情况以及行军途中对组织纪律的要求。

十一月五日，开始了长途行军。由于以后行程都是刚解放的地区，在物资上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每人灌足了米袋，一般在十斤左右，发了一个竹筒内装食盐，既不怕雨淋，又便于携带。在湘西道上，从桃源出发，经沅陵、三角坪、辰溪、怀化。十一月十八日抵湘西重镇——芷江。抵三角坪时，我们跟川东支队分了手，他们经川东到重庆，我们则取道贵阳，从贵阳进川南。湘西属山区，有时走公路，有时走小路。冬天的湘西，阴雨连绵，路很难

走，特别是小路，又溜又滑，摔跤的人不少，再加上行军三天，大家的脚板底都是大泡小泡，步行军确实是艰苦的。但是大家情绪很高，互相帮助，互相搀扶、互相鼓励，每天均能胜利到达宿营地。湘西匪患严重，野战军追歼国民党军队，顾不上剿匪；地方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暂时也管不了。土匪加上残留下的国民党军、警、宪、特，对大部队不敢妄动，但对我们这支基本上没有武装的解放军却虎视眈眈，伺机进行偷袭。特别是对个别掉队的同志，有的是暗中袭击，当场杀害；有的则抓上山去加以杀害。虽然野战军派了一个警卫营护送，其主要任务是警卫支队部、区党委和行署，再加上行军战线拖得很长，难以全面照顾。上级要求我们以中队为行军单位，尽量少掉队、不掉队，万一有同志掉队，必须组织收容队，绝不能丢单。另外，每组发了一支步枪，每个人发了两颗手榴弹，以作防卫之用。各中队主要依靠自己警卫。白天行军晚上宿营后还得站岗放哨。

在芷江休息两天，十一月二十一日继续行军，向贵阳进发。沿途经过晃县、玉屏、青溪、盘溪、镇远、施秉、黄平、贵定，于十二月五日抵贵州省会——贵阳。这一段路程比在湘西还要艰苦。人称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进入贵州后，崇山峻岭连绵不断，几乎每天都是爬山下坡，真是山高坡陡路险。有时公路盘山而上，走公路往往要多走几里甚至几十里，为了减少路程，改走小路。山区小路实在难走，再加上整天阴雨不断，石板路就象擦了油似的，三步一滑，五步一摔。上山要用手帮忙，下山则坐梭梭板。整天泡在雨中，虽有雨伞，浑身上下依然是湿淋淋的。每天一到宿营地，除了吃饭，烫脚、就是烤棉衣、棉裤。我们在贵州走了一个多月，只有三天没有下雨，还是阴天，在贵阳才看到半天阳光。

贵州老百姓的生活比湘西更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沿途经常看到一丝不挂的男、女孩，成年人甚至妇女也是赤身裸体，只用一根草绳吊一破席或玉米叶编织的围腰遮盖。据说有些人家，一家人只有一、二套衣服，谁出门谁穿。看到群众这样的苦寒，同志们纷纷拿出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们。可是，车薪杯水，实在无济于事。只有加快解放的步伐，从事经济建设，让穷苦百姓翻身。

到达贵阳之前，在马场坪接前线来电，川南大部解放，急需干部去接管。老干部和女同志以及病号乘汽车先走了。我们继续步行。

贵阳休息两天，十二月八日继续行军向川南进发，沿途经过清镇、卫城、黔西、甘棠、大定到毕节。十二月九日，在卫城宿营时，我们二中队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同队战友陈杰同志，不慎从住宿的楼上摔下来，脑部重伤，当地缺乏医疗条件，不幸去世。为此，大队刘安副政委率同二中队全体战士为陈杰同志举行了追悼会。壮志未酬，意外地亡故，实在令人遗憾。大家怀着沉痛的心情向陈杰同志告别。比大部队晚了两个小时，又踏上征程。

在毕节休息一天。十二月十七日继续行军，经过八场坪、燕子口，十九日终于跨过川黔交界的赤水河，进入四川境内。这里虽然是川黔交界处，但比贵州好得多，田野里一片绿色，满山遍野种植大麦、小麦，看起来比贵州要富庶一些。渡过赤水河来到赤水镇，从县人民政府张贴的布告知道，我们已经进入四川的古蔺县境了。

继续行军。十二月二十二日到叙永，休息一天。二十四日到江门，二十五日到渠坝驿，二十六日胜利抵达泸州——川南区党委和行署所在地。在泸州休息一天，二十八日继续向本大队的目的地——内江进发（资中地区改为内江地区，内江地委和专署设在内江），十二月三十日抵达内江。

在内江休息两天，听了地委书记原大队政委陈刚的报告，宣布我们具体的工作地点。我们二中队除了少数同志留地委和专署外，大部份分到简阳、仁寿两个县。我们分在简阳，二中队的中队长杜子云任简阳县委书记，指导员李志深任简阳县长，并在十二月二十日已抵简阳。由于人手太少，要求我们尽快地赶到。我们分在简阳的三十多位同志，在内江度过了一九五〇年的元旦。于元月二日启程，行军四天，元月五日胜利抵达七千里进军的最终目的地——简阳县。

曾经有人认为，我们这群来自富庶的江南水乡的学生兵，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担心这七千里长途行军坚持不下来。可是，事实证明我们坚持下来了。行程七千里，跋山涉水，忍饥耐寒，艰苦跋涉，依靠两条腿走到西南。开始每天行军三、四十里，逐步增加到六、七十里，大部分时间平均每天八十里，进入川南后每天走百里以上，最多时走一百二十里。脚板底打起了“泡”，用头发穿破，第二天继续走，表现了极大的吃苦精神。除了走路以外，行军途中的生活更是异常艰苦。在湘西和贵州境内，除了一些县城所在地，一路上很少看到比较象样的集镇。当地群众对解放军还不了解，听信反动派的谣言，逃进深山，十室九空，许多村庄一片荒凉。买不到新鲜蔬菜，更吃不上猪肉，有时用萝卜秧煮一大锅汤，有时干脆用盐下饭。清晨天不亮起床，要在半小时内完成穿衣、打背包、解便、吃早饭等一系列锁事，接着整队出发。动作稍慢一点的同志，刚端上碗或仅仅吃了一半就吹集合号了。只好用漱口盅装满，等到在路上大休息时再吃。不少同志因此患下了胃病。背上的负重在桃源时虽然经过反复精减，一般仍有三、四十斤，个人的物品可以精减，但十斤大米，一筒盐和两颗手榴弹是不能少的。长途行军肩膀上多一斤重量都是非常见分晓的。晚上宿营后还要轮流站岗放哨，同志们体力消耗很大，普遍疲劳而且困盹。可是，大家情绪很高，以苦为乐，一路上歌声不断，有人戏称我们这支队伍是“军乐队”。“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是主旋律。《到西南去》，《走，向着大西南走》、《团结就是力量》、《行军小调》，在路上唱，到了宿营地又唱，似乎我们有无穷无尽的精神。确实，歌声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忘记了疲劳。每当暮色苍茫，宿营地遥遥在望时，也正是我们最疲劳的时候，大家唱起了“一百里的路程走了九十九，今天的宿营地就在前头”，振作起困倦的精神，昂首阔步进入宿营地。

历史证明，我们这群当年的青年知识分子是能够吃大苦、耐大劳的。姜寿生同志离南京时重病初愈，上级动员他去南京留守处，他坚决要求随大队伍一起，一步一个脚印走到四川。除了陈杰同志在途中不幸去世外，我们二中队的全体战友包括女同志在内，没有开小差的，没有退出革命队伍的，全部胜利抵达目的地。

我们这支队伍继承了我党我军优良的革命传统，在老干部的带动下，大家思想统一，行动统一，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群众的庄稼，不拿群众的针一线，在离开驻地的时候，借的东西归还，损坏的赔偿，里里外外打扫干净，这些老八路的作风，我们这支队伍继承了。虽然这都是些小事，但是都赢来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保护。

战 斗 在 简 阳

抵达简阳后，我们迅速投入了各级政权和各部门各单位的接管工作。不久，就配合二野军大和十军下地方的同志，一起开展了征粮剿匪、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镇压反革

命、民主改革等一系列群众运动。

一九五二年全县土地改革结束后，分别调入党政、文教、财贸、工交、农林等各条战线，从事简阳的社会主义建设。

一九五〇年，先后来到简阳的西南服务团团员（不包括老干部）共41人。主要是五大队二中队和四大队（财经大队）的部分同志。在一九五〇年的征粮剿匪战斗中，缪小京、顾树森、蔡宪章、吴硕四位同志光荣牺牲。他们为巩固新生革命政权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以鲜血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永远值得我们深深的怀念。曹奇、甘泽、张宗仁、姚梅等五位同志，由于因病因故，而不幸过早的逝世，他们为简阳的革命和简阳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们深深怀念这些共同行军，共同生活、战斗在简阳的战友。先后由于各种原因离开简阳的有20位同志，他们有的是调地委和行署机关；有的是技术归队参加工业建设；有的投考大学，读书去了；有的照顾夫妻关系调到别的地区；有的回了江苏老家。现在仍然工作、生活在简阳的西南服务团老战士还有十二人。

西南服务团胜利进军大西南，已经过去三十八个春秋，我们这些当年20岁左右的青年学生，现在大都两鬓斑白，进入花甲之年了。我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为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多数同志担负着各级领导重担，有些同志积劳成疾，有的同志受错误路线的影响受到委屈和挫折，特别是十年浩劫期间，大多数同志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受到冤屈的同志大多数已经平反，落实了政策；也还有个别同志的政策，迄今还未得到落实。

三十八年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挫折，我们从来没有失悔过我们选择的道路，我们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我们没有虚度自己的青春。我们紧跟中国共产党，一辈子干革命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

老年节书怀

乔新象

莫道无花空折枝，
枝头留影有相知。
春蚕死后丝犹在，
梅蕊凋时香尚遗。

绮岁投枪摧旧垒，
老年走笔赋新诗。
男儿出处轻名利，
喜看龙孙绕凤池。

一九八八年九月

我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前前后后

沈 群

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有关键的几步，走对或走错了，往往影响整个一生。回想我参加西南服务团，进军大西南，到简阳县这段不寻常的岁月，感到在青少年时期尤为重要。

投 笔 从 戎

解放前，我在江苏省吴江县立中学念书。一九四九年四月苏南解放了，吴江解放了。老百姓高兴极了，整天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政府号召，有志青年投身革命。我带着革命光荣的信念，和本校同学计重远、蒯千里，马华、唐海珊，任孝文等，第一批参加革命工作。最初，我是分在吴江县黎里区政府，任文教干事。

不久，党在《苏南日报》上号召“打到西南去，解放全中国”，动员青年报考西南服务团，参加解放四川、云南、贵州、西康等省的解放战争。于是，大家又踊跃参加进军大西南。但当时江苏解放还不到三个月。新解放区群众的觉悟还不高，又有“好男不当兵”，“好女不出门”的传统影响，加上各种谣言很多，因而我们都怕亲人阻挠，家庭拖后腿。所以在报名时，绝大多数同学都改了姓名。我的沈群这个名字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八月二十八日，我持中共吴江县委介绍信，赶到无锡市西门外阵大巷苏南区西南服务团团部报了到，从此离开了家庭，告别了故乡，走上了进军西南的道路。我被编入西南服务团苏南区一大队二中队。

我们一入伍，就开始学习。主要学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学习团长宋学武、付团长熊宇忠作的报告，内容全是新鲜有趣的革命道理，还教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到西南去》等革命歌曲，并进行了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

启 程 之 后

我们很快就到了南京，驻在南京的鼓楼。接着是一阵紧张的长途行军演习。一是演习整装待发。凌晨或休息期间，一听到号令迅速起床，在十五分钟内不仅穿戴整齐，捆好绑腿，打好背包，而且生活用品也要装包佩好，还要集合整队。二是演习行军。每天早晨背上背包和生活用品。开始步行三四里，每天递增一二里，到最后一早晨往返要走二十余里，为长途行军作准备。至于思想准备则更为充分。近三个月来，先后在无锡、南京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学习，初步学得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法规，初步学会用辩证法观察问题，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邓小平政委给我们作的谈忠诚老实的报告和刘伯承司令员在欢迎上海西南服务团到南京会合大会上的讲话，更是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邓政委说：党的思想

路线和工作作风就是实事求是。大家要老老实实在地改造世界观，老老实实在地说话，老老实实在地做事，老老实实在地学习，不说假话、空话、大话，做一个老实人，一辈子老老实实在地为人民服务。刘司令员说：“解放战争，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历史上是最光辉的一页。”“有的同志想参加打仗，这想法是好的。但一般说来没有什么大的打头了。国民党军队一打就垮，现在不打就要垮，恐怕各位是‘有用武之志，而无用武之地’。希望各位多在经济建设上为人民服务，使他们翻身，把西南改造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刘司令员还指出：“你们将来要吃苦，要爬山，要涉水跑路，这些都是必然遇到的困难，在思想上要有准备。在课堂上说为人民服务是容易的，在忍饥受寒的革命队伍中参加真正的斗争是不容易的。”这些恳切的教导，句句打在我们心坎上。

1949年10月1日，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是我们伟大的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的日子，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从南京出发，向大西南进军的一天。这天凌晨一点，忽然听到号令，大家迅速整理好行装，很快用完早餐。凌晨两点，我们结束了在南京的军事训练生活，整队出发。夜空黑沉沉的。雄壮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在街灯的照耀下前进。当我们通过新街口时，街心花圃上张灯结彩，红旗飘扬，街道两旁站着长长的欢送队伍，顿时锣鼓喧天，口号声此起彼伏。这是金陵女子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同学们组成的腰鼓队和秧歌队，他们在更深夜静中来欢送我们，带来了南京人民的希望和鼓舞，我们感到无比兴奋和激动。队伍行至原国民党行政院时，突然大雨滂沱，倾泻而下。我们每个人虽然都有雨伞雨衣，但下半身仍被淋透。队伍到达下关渡口，三艘渡轮一时难以装载庞大的队伍，我们在风雨泥泞的路上站立了约三个小时，才渡江到了对岸的浦口。这时天色微亮，而雨仍在下着。

由于前线战况发展迅速，二野首长要求我们：第一、必须争取时间，尽快到达湖南，再从湖南徒步行军到四川；第二、为了避免敌机的袭击，不走长江水路，而从陆路乘火车由津浦路北上徐州，再西行经郑州南下到武汉，由武汉到湖南岳阳，从岳阳横渡洞庭湖到益阳。这也就是我们第一阶段的行程。第二阶段的行程，是从湖南益阳开始徒步行军，沿川湘公路西行，经湘西山区，越过贵州部分地带，进入四川，到达内江简阳，共计行程约七千余里。为了避开敌机的骚扰，我们在浦口停留了一天，上级安排我们当晚六时从浦口乘车夜行。我们坐的全是货车，没有座位，也没有货架，车厢是个光桶桶。男女分别坐车厢，我们车厢人均不到半平方米，地板上积满泥水。登车后，大家将泥水扫出车厢，把每人所带的草席铺在潮湿的地板上，然后把每人的被包依次排列，被包之间放上挎包、水壶、雨具、干粮等杂物。这样人挨人物挨物，整个车厢挤得水泄不通，既不能躺，也不好坐。如果有人要爬出来大小便，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为了防飘雨，把几个不大的窗门都关上了，车厢内无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是个别同志因找东西偶尔亮一下电筒。

挺 进 西 南

十月二十日，从岳阳乘船飘洞庭湖。我们蜷伏在木船上，经过两天三夜才渡完洞庭湖。二十二日拂晓，船到益阳。至此第一阶段的行军任务胜利完成，我们大队没有损伤一兵一卒。我们在这里停住了二十余天，进行休整总结，并为下阶段的行军作组织上、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十月二十四日从益阳出发，开始徒步行军。二十七日到达桃源县城，这一段比较平坦。在桃源休整七天，再次调整队伍，我们被编入五大队——资中大队（即内江地区）二中队，中队长是杜子云同志，指导员是李志深同志。再往前走，就进入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山区。这一带刚解放不久，匪患严重，粮食不足，食盐缺乏，山路险峻，因此每人配备了二颗手榴弹，一个班配备了一支步枪，一人十斤左右的米袋，一竹筒盐巴，加上被包用具等每人负重二十多斤，走在又陡又滑的山路上，的确是艰苦的。十一月十八日到达湘黔边境的芷江。在芷江休息两天又继续行军，进入贵州地区。这一段比湘西的山更高，路更险，雨更多，人称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就是指的这一带。黔东南苗族自治州一带，崇山峻岭连绵不断，小路多是上坡下坎，公路有时盘旋而上。走公路往往要走许多路程，为了加快行军时间，减少路程，只好改走小道。可是小路实在难走，加上整天阴雨绵绵，石板路就象长上了一层青苔，三步一滑，五步一跤，上山只好用手帮忙，攀藤拉草，下山手脚屁股并用，有时象坐梭梭板。一天行军下来，人人都是满身泥水。到了宿营地，除了吃饭以外，就忙着烫脚，烘烤衣服。沿途山区百姓的生活更是苦到极点。我们经常看见一群一群的赤身裸体的男女小孩，成年人和妇女也多裸露上身，只有一根草绳吊一块破席或玉米叶编织的“围腰”遮羞，站在路旁啼饥号寒，我们看到群众这样贫苦，便纷纷挤出自己的部分衣物送给他们。但杯水车薪，实在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

十二月五日我们的队伍抵达贵州省会——贵阳。在到贵阳前面的马场坪，部队首长接到前线来电：川南大部分地区已解放，急需干部去接管。于是首长安排老干部和我们女同志以及病号乘汽车先走，其他同志继续步行前进。我们跨过黔川交界的赤水河，进入四川境内。虽然远在川黔交界处，但看起来比贵州好得多，田野里一片绿色，满山遍野种着大麦小麦，人们穿着打扮也比贵州富庶一些。渡过赤水河，到了赤水镇，看到县人民政府的布告，我们才知道已经进入四川古蔺县境了。继续前进到叙永、江门、渠坝驿……，胜利到达了川南区党委和行署所在地——泸州。我们在泸州休息了一天，又向本大队目的地内江进发。到达内江后，听了新任地委书记（原大队政委）陈刚同志的报告，并向我们宣布了具体的工作地点。我们二中队除少数同志留地委和专署外，大多分在简阳、仁寿两县。我们第一批分到简阳的女同志有我、苏企、孙建华、姚梅、曹奇、高银清等六人加上男同志共十多人，在中队长杜子云（简阳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指导员李志深（简阳县第一任县长）的带领下，于十二月二十日抵达简阳。我们在简阳渡过了新中国诞生以来的第一个元旦节。元月五日，地委又分了中队的三十多个男同志来简阳。事实向人们宣告：我们这些来自苏杭鱼米之乡的学生兵，爬山涉水，忍饥耐寒，艰苦跋涉，依靠两条腿，行程七千里，闯过三大关，来到了祖国的大西南，经受住了大风大浪的锻炼和考验。

从此，我们就在简阳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三十九年来，我们为简阳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为简阳的父老乡亲们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缪小京烈士传略

陈永德

缪小京，原名缪汉祥，一九二八年出生在江苏宜兴县。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解放了缪小京的家乡，当时在江苏无锡社会教育学院就读的缪小京，迎得了解放。

一九四九年五月，江苏苏南区党委举办了苏南公学，缪小京转入苏南公学学习。在这个新型的革命熔炉中，他学习了《中国革命史》、《论人民民主专政》、《共同纲领》等革命文献，政治觉悟提高很大。七月，他毅然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在离开无锡到南京整训的前夕，缪小京的爱人带着刚满周岁的女儿赶到无锡，要求他留在苏南。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缪小京对爱人说：“要不是共产党，哪有我们的今天。现在我们不应当只想到自己，西南人民还生活在苦难之中，祖国需要我们。我走之后，家里的担子将落在你的肩上，你就更辛苦了。”他终于说服了妻子。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缪小京告别了亲人和家乡父老，踏上了向四川进军的征途。在艰苦的行军途中，缪小京白天常帮助体弱的同志背背包、米袋，晚上站岗放哨。当战友疲惫的时候，缪小京就用口琴吹奏一支支有力的歌曲，驱散战友们的疲乏，激励战友们前进。

一九五〇年元月五日，缪小京和战友们经过千辛万苦的长途跋涉，到达了目的地，分到简阳县工作。县委任命缪小京为政干校第五中队队长。由于简阳县刚解放，一方面还要巩固新生的政权，一方面要支援西藏解放，人民急需粮食，征粮工作成为当务之急。为了工作的需要，缪小京又调任五区征粮工作队副队长，分工负责江南、平武、普安等乡的征粮工作并兼任江南中心工作组组长。不久，又被指派为五区财粮助理员。缪小京带领工作队员，不顾个人安危，日夜深入山沟村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征粮工作。为了加快征粮工作的步伐，缪小京利用江南铺逢场天，带领工作队员上街以扭秧歌、打金钱板等文艺宣传形式，边演边唱边讲，把党的征粮工作的重大意义传给了人民群众。缪小京还深入保甲，不厌其烦的向群众讲解党的政策。由于他是江浙口音，群众一时听不懂，他就反复讲解，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讲清为止。群众亲热的称呼缪小京为“缪解放”，“指导员”。缪小京平易近人，团结同志，经常到工作队员住处问寒问暖，工作队员也乐意向他摆谈心里话，同志们都亲切的称他为“缪大哥”。工作队员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缪小京就耐心帮助，分析原因，找出问题，制定克服困难的办法，使工作队员的实际工作能力得到提高。当时的江南乡，粮食主要集中于地主、富农家中，缪小京针对这种情况，首先从开有双糖坊的大地主黄维新着手，每天组织群众百余人，集中在黄维新的糖坊征粮（以糖抵粮）。开始少数群众有顾虑，问：“担黄维新的糖，给不给钱？”缪小京就向群众解释说：“地主的糖、粮都是剥削你们的，他们欠我们的太多了，这次担糖是抵他欠政府的公粮”。群众听了这些话干劲更大了，在短短的一个

月内，就征糖十万斤，运到简阳酒精厂（简阳糖厂的前身）公用。

随着征粮工作的不断深入和新生政权的不断巩固，极大地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以樊巨川为首的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同地主阶级、封建反动把头、袍哥，相互勾结，妄图推翻人民政权，夺回失去的天堂。

一九五〇年农历三月初二，缪小京一清早就和乡农民代表李之能等三人前往四保催粮。由于头天传来了踏水乡工作组长被害的消息。缪小京就身背冲锋枪，腰挎手枪和手榴弹，作好了应付突然事件的准备。缪小京和其它工作队员来到四保，组织群众，征收黄维新的公粮。群众见有工作队撑腰，干劲特别大，从早晨一直干到下午。下午四点左右，江南乡七保分队副从石钟方向（清水埡）引来一股暴匪。顿时四处传来了“杀工作队，杀解放军”，“捉活的”吼叫声，挑运粮的群众开始骚动起来。随着吼声，暴匪占领了黄家糖坊四周的山头，对糖坊形成包围圈。在这危急关头，缪小京镇定自若，察看了四周情况和地形，果断地命令工作队员刘济谦、周凯和农民代表李之能组织群众撤退，他自己负责阻击和掩护。话一说完，缪小京迅速爬上左侧的一个小山包，抢占有利地形。由于暴匪先行一步，占领了制高点，缪小京完全暴露在暴匪的火力之下。但是，缪小京沉着射击，边打边撤退，把匪徒的火力引向自己，掩护人民群众和工作队同志撤退。当他撤退到高堽口下50米的一条土埂边时，不幸被土匪子弹击中，壮烈牺牲，时年只有22岁。其余三位同志也被暴匪杀害。

暴乱平息后，战友们含着热泪，把缪小京的遗体运到江南铺，安葬在一小溪畔，长眠在他战斗过的土地上。

观 东 灌 渠 放 水

尚 禹 川

龙泉山势矗崔巍，谁遣都江堰水来。
凿岭穿山轻险阻，越阡度陌任萦洄。
狂澜试挽消洪患，蜀浪翻回去早灾。
听取欢声歌伟绩，民康物阜跻春台。

峰峦横渡导岷江，万顷良田灌溉忙。
秋稼如云饶景色，春苗似锦漾晴光。
惊涛远引如飞渡，潜力深挖无尽藏。
建得农村基础好，进军四化竞登场。

忆四川大学“四九血案”周年纪念活动

陈 寿 余

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王陵基就任“四川省主席”。这天，四川大学、华南大学等校学生一千余人到省政府请愿，要求惩处囤积居奇的奸商，配发平价米……，王陵基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实行残酷镇压，指使军警打伤学生数十人，逮捕一百余人，其中川大学生被捕一百零四人。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成都“四九血案”。

一九四九年四月九日，是“四九血案”一周年纪念日。四川大学在地下党和民盟、民协等的组织领导下，为了避免更大的流血牺牲，决定这天不进城游行，只在校内活动。早晨，川大图书馆大楼上挂出了一幅巨大的标语，上面写着：“今天纪念我们自己的日子，明天为他们送丧！”严肃、悲愤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川大。

白天，平静地过去了。到了傍晚，川大就沸腾了，因为“四九血案”周年纪念晚会就要在川大广场上举行。川大广场的中间悬挂着九盏明亮的煤气灯。校内外的师生和群众近万人参加了这个纪念晚会。大家围成一个大圆圈，坐在草地上，观看晚会的节目。这些节目，都是川大同学自编自演的，他们用文艺表演形式，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和表达自己的期望。记得演出的节目有《四九血》、《灵官扫台》（当时人称王陵基为王灵官）、《转咒》等十几个节目。

晚会的主持人是“川大话剧研究社”（简称“剧研”）负责人之一的余天觉同学。当时我也是“剧研”的成员，也参加了演出。我们“剧研”演出的节目就是《转咒》。《转咒》的内容，是一群和尚在为“好战分子”送丧和“超度”亡魂，讽喻发动内战的好战分子逃不脱灭亡的命运，反动派即将丧生。里面的主题歌《好战分子悼歌》，歌词是我写的，曲调是歌剧《白毛女》中黄母在佛堂诵经的曲子。歌词是这样的：

“这年头，我们受饥饿，又受寒冷，都是你，好战分子，做的好事，今天你死了，我们很伤心，我这里，想哭无泪三叩首。

想当年，人家穷苦，你独欢喜；无非是，你生财有道，战神保佑；我们老百姓，当然该受罪；我这里，诚心诚意三叩首。

到今天，人人觉醒，你却长睡，这真是，岂有此理，颠倒乾坤；和平与民主，把你无情杀害，我为你，短命老爷三叩首。”

我们捧着“好战分子之灵位”的“灵牌”，正要上场演出的时候，人群外面的草地上突然轰地一声，燃起一股大火。虽然火很快就熄灭了，可是人群乱了，我们的“灵牌”也被挤破，演出只好暂停。乱了一会之后，会场上响起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顿时歌声大震，人们在混乱中清醒过来，意识到这是特务在捣乱。接着，在“打倒特务”的口号声中，大家手挽手，重新按秩序坐好，演出继续进行。接着我们修补好“灵牌”，也上场演出。但是特务们还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又第二次放了一把火，不过这就不那么“灵”了，人群并没

有乱，而且同学们自动组织了数十人到周围巡逻，使晚会顺利进行下去。

晚会结束后，群情激愤，同学们手挽手地又在校园内游行。歌声口号声响彻夜空，响彻了整个川大。当同学们回到宿舍，已是深夜了。第二天起来，我和一些同学的嗓子已经嘶哑了。

可恨的是，国民党特务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十天后，即4月21日凌晨，这次纪念晚会的主持人余天觉同学就被特务逮捕了，并在成都解放前夕惨遭杀害，成为“十二桥殉难烈士”之一。

社会贤达李霜如

张存智 徐正唯

李为纲，派名圭璋，字霜如，一字双如，清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年）出生在简州西乡草池堰石岗湾（今简阳县贾家区海螺乡）。五世祖扬先，曾任广西镇安府（今广西德保县）知府。高祖煌，以副榜为长宁、苍溪教谕。堂弟伯玉，字为纶，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同盟会会员，早期国民党员，民初国民党籍众议员，曾任广东军政府司法部次长，四川省教育厅厅长等职。

李霜如6岁入塾，天资聪颖。曾用冬季塾师回家时期，读熟《周礼》一部。七八岁时，能用小凳垫脚，在案上书写过年春联。此后七十年间，习以为常，爱好撰写联语。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李霜如以第二名补博士弟子员入学，1894年，补廪生，在成都锦江书院读书3年，与邑人汪金相同学。后因父病，李霜如终止学业，回乡侍奉双亲，读书务农。1898年，李霜如在乡监修李氏族谱。1901年，李霜如父亲病故后。当过小团团首。1903年，西乡久旱后，又遭涝灾，李霜如倡议成立“沟底会”，开沟疏浚，消除水患，排解了乡民因灾患斗殴争讼的纠纷，得到乡邻拥护。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停科举，开办新式学堂。简州成立高等小学，傅润生任校长，李霜如和汪金相同任监学，李霜如并任文史教员。随即开办学务局。1906年，改学务局为劝学所。李霜如任副董。1907年，附设农务局在学务局内，李霜如兼任农务局局长。1908年，在铁路租股局开办的第二年，李霜如又兼任租股局局长，推行新政，不遗余力。

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李霜如36岁，由廪生举孝廉方正，在成都会考。因母亲病重，未赴廷试，归家侍母疾。1910年，李霜如被委任草池堰保正。当时，四川保路同志会兴，土匪乘机而起。西乡30余场共议办团防匪，设筹防公所，推举汪金相为所长，李霜如为副所长。团防公所守卫严密，境内治安得到保证。但保路同志会发展时，李霜如坚持制止率队参加。1911年简州成立州议会，李霜如被选任议长，因母病重，侍养在侧，未赴州。州议会未开会，而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

民国元年（1912年），李霜如因母亲去世，悲痛不已，加之对辛亥革命认识消极，更觉人生无味，不问时事。1913年，李伯玉在北京任国会议员，李霜如曾去北京小住数月。回县

后，改州议会为县议会，李霜如仍任议长。当时县中捐输，多于全省各县。李霜如为民清命，求省财政厅减少数额，使之与各县平均，未得允准。1914年，袁世凯窃国，阴谋帝制，解散议会，李霜如返乡居住。

1915年，李霜如长子李勋华，因债务案判处3年徒刑，拘于县狱。署理县知事孙守正接任时，正当袁氏筹安会拥戴帝制最烈，密令各地严防“乱党”。9月，忽有疯人，白昼持刀闯入县署，卫队见其凶猛，开枪击毙。当时有奸人乘机诬告，说李勋华叔父李伯玉，是民主党要人，回县组织反对筹安会团体，疯人定是李家收买来劫监行刺的。孙守正即疑李勋华必为“乱党”，不及详察，就将李勋华问案处决，并将疯人首级示众。同时封闭县农会，撤换地方税绅首。李勋华妻贺氏上控，成都高检厅派人彻查，真象毕露。疯人行为与李勋华无关。孙守正向心有愧，潜逃回浙江原籍，念佛隐居。直到15年后，孙守正因事到成都，被李霜如突然遇见，李霜如便将孙守正扭回简阳，交县政府讯办。经审讯后，以过失杀人罪论罪，按律判处徒刑2年。由于孙守正当时年近七旬，身染重病，准邀保调治，宣告暂缓执行在案，李霜如也不再控诉。有人劝李霜如杀孙。李霜如回答说：“人已知错杀吾子，我杀孙其无错乎？倘孙、李、李世世相杀，此怨何时得了？”孙守正为此十分感动，追悔当日经过情形，略述梗概，泐石刻树《解冤碑记》，在县城公园内。

李勋华被冤杀，对李霜如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连他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几乎不保，使他意识到要好好生存在社会上有所建树，才能自保。

1916年，袁氏败死后，简阳县议会恢复，李霜如仍为议长，县议会改选后去职。1917年，李霜如被县推举为清算员，去成都参加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清理租股局帐目。当时川军刘存厚驱逐滇、黔军，在成都城中巷战激烈，会未结束，代表四散。李霜如在成都街上遇见川西道尹熊成章，被邀入道署，两人谈治安甚相得。李霜如即被熊委为顾问。不久，熊又推荐李霜如代理理番县（今理县）知事6个月。在任期中，李霜如廉洁自奉，约束部属，对少数民族不歧视。他还兴办学校，创修理番县志书。当时，屯垦司令陈戎生打算调李霜如作灌县知事，替他督派军费。李霜如不愿增加民众负担，便辞职返回成都。

1919年，李霜如被简阳县选为第二届四川省议会议员，到成都任职。至1927年解散省议会才回到简阳。其间，1922年简城北门万安桥被洪水冲毁，1925年重修万安桥，重建栖流所，刘焕门为主任，李霜如为副主任。四处筹筹资金，经年余时间，总成其事。1925年，四川各地修建马路，简阳议修成简马路，李霜如任成简马路公司董事。1931年3月，李霜如任简阳县建设局长，8月离任。1932年，李霜如任简阳县保卫团副团长，数月辞去。1933年，红军在川北一带节节胜利。全川震动，简阳县以保卫团为基础，分设3个联防办事处，西乡一、二、三、四区在草池堰设联防办事处，组织地方团队，由刘焕门任主任，汪金相、李霜如任副主任。当时集中一千余人，分设4个大队，16个中队，训练三四月后，第二年春农忙遣散回家生产。在训练期中和以后，草池堰和附近各地未出现任何事件，因此团队没有活动。

1934年，李霜如以病退職赋闲家居，不问政治。十余年间，历任县长乔诚、黄幼甫先后聘他担任县参议会议长、修志局局长，李霜如都婉言谢绝，在家常读周易及堪舆书，直至解放。

临近解放前两三年，中共地下党员傅承笃，是李霜如外甥，常利用李霜如在地方上的地位，开展地下活动。国民党简阳县党部部长徐孟明常欲迫害傅承笃。李霜如为之缓颊，出

面保护，傅承筠得免于难。

1949年，简阳临近解放，李霜如接受了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宣传，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愿意为解放简阳尽力。

1949年12月15日，简阳解放。12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在县参议会主持召开各界知名人士会议，正式成立了简阳县人民解放委员会，李霜如被推选为主任委员。12月30日，县人民解放委员会改组为县支前委员会，李霜如任副主任。1950年后，李霜如又任县征粮委员会副主任，土亩清查委员会研究小组主任等职；并被选为川南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简阳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二届、第三届县各代会副主席。

1955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阳县委员会成立，李霜如被选为县政协第一届常委。1956年以后，李霜如被选为第二届、第三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在这期间，李霜如虽已年逾八旬，但是仍然积极参加政治时事学习，看了很多马列主义书籍，并且常与接近他的人宣传党的政策。

1959年元月9日，李霜如因病治疗无效，在简城逝世，享年86岁。

李霜如曾任李氏同宗会族长，及联县同宗会长。李霜如父辈兄弟三人，么叔早亡，霜如父排行第二，李霜如幼时兼承两房，继承两房田产一百八十余亩。本房娶妻鄢氏，所生子女有：长子李勋华，冤死；三女李蕴华，早死；四子李国华，又名仲康，国民党特务分子，1955年在成都市被镇压；五女李蕴贞，曾任教员；八女李蕴静，简中教员；九女李靖华，曾任简女中校长，三青团简阳负责人，曾参加国大代表竞选，镇反时被处决。兼承么房娶妻鄢氏，所生子女有二女李紫龄，早死；六女李蕴闲，曾任小学校长；七子李国瑜，国民党员，县参议员。曾任简中校长，后在禾丰中学任教，已故；十女李英华，川北大学毕业，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李霜如1920年在成都由李伯申介绍，参加国民党，与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相交好，时有过从。在任省议员期间，国民党省党部委李霜如回县办党，李霜如退还了委任状，不愿过问县党事。不久，清党后，李霜如被国民党除名。解放前夕，李霜如曾加入熊克武、但懋辛倡立的三民主义知行社（这个知行社是熊、但等人在成都以民革等成员以三民主义瓦解国民党的一团体，简阳成立是李伯玉挂名，写上李霜如名字借以号召县人）。在40多岁时，李霜如因病加入刘止唐槐轩教，学习静功，后又转学罗春普戒烟会的功法。

李霜如青年时代，在政治上有光宗耀祖，炫耀门庭，显声扬名以慰父母的强烈愿望。他受封建道德影响，对“忠”、“孝”非常重视。一生的言行，都以儒家的思想为根本。在清末考取秀才和补廪又举孝廉方正后，对辛亥革命他是持保守观望态度的，所以操团练保土安民，而坚持反对参加同志军，同时也不率队攻击同志军。

李霜如在省和地方任职甚多，时间长达三四十年，律己甚严。凡在任职中，从不贪污，一介不取。即使吃人一餐饭也不苟且，烟酒嫖赌等一切不良嗜好，从未沾染。对于所任职务，认真负责，从不敷衍，也不矜奇主异。恪守“当乱世不当妄动，做事当不昧良心”的信条。他对人谦虚和蔼，宽厚自重，不以势欺人，处事主张公平对人，受到县人尊敬。

李霜如进入老年后，看到国民党日益腐败，国是日非，民生百困，地方派系复杂，尔虞我诈，社会混乱，非常不满。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无法为人民作事。于是寄情山水，遂有遁世之志，以求保身。然而为国为民作事之心，从未稍减。在抗日战争时期，李霜如受到身